

社会治理与职业教育时间耦合性的研究

方道华

(江西财经职业学院 江西九江 332000)

摘要: 在我国的文明史上, 社会治理(国家层面在 2014 年前没有这个名词)和职业教育(1922 年以前没有这个名词)有关的活动一直存在, 基本上保持一致性。不管是远古时期的奴隶社会时代, 还是当前的数字经济时代, 职业教育都是社会治理的一个子系统, 在推动社会治理不断完善的同时, 也受到社会治理制度的影响。作为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前的职业教育是教育的一种类型, 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 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框架下, 必将走上高速、健康的发展之路。

关键词: 职业教育; 社会治理; 中国史; 职业本科教育

A study on the time coupling between social governance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Daohua Fang

(Jiangxi Vocational College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Jiujiang, Jiangxi 332000)

【Abstract】 In the history of China's civilization, activities related to social governance (there was no such term at the national level before 2014)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there was no such term before 1922) have always existed, basically keeping the same. Whether in the ancient era of slave society or in the current era of digital economy, vocational education is a subsystem of social governance. While promoting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social governance, it is also affected by the social governance system.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n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the current vocational education is a type of education, which has its own law of development. Under the framework of social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it will surely embark on the road of rapid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keywords】 Vocational education; Social governance; Chinese history; Undergraduate level vocational education

社会治理和职业教育并不是当前特有的社会现象, 中国自古以来一直都存在有关的活动, 只是近些年来受到全社会重视的程度越来越高, 并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在对我国职业教育发展历程梳理的过程中, 笔者发现社会治理与职业教育在时间上具有高度一致性。

一、古代的社会治理与职业教育

自近现代(史学界以鸦片战争作为分界点)以来, 我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革, 掀起了“西学东渐”的社会潮流, 教育体系和形式基本上完全模仿西方国家, 与以前的以私塾(书院)和科举为教育的主要形式完全不同。

(一) 奴隶社会时代

史学界一般把春秋战国以前的社会称为奴隶社会, 政权主要以分封制(主要是宗室成员)为主的形式, 奴隶主对封地拥有很大的自主权, 教育是贵族阶层的特权。然而, 为了提高社会生产力, 奴隶主也会重视农艺、制陶、织布、建筑、养蚕制丝等原始手工业的发展, 师徒传授的雏形已经出现。到了墨子所处的时代, 师徒传授已经突破了家族的边界。

(二) 封建社会时代

自秦汉以来, 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史上, 法家和儒家学说(汉武帝之后, 基本上是儒家独大)是朝廷进行全国统治(当时采用君主专政制度, 还没有社会管理一说)的主要理论, 经济也远远没有当前发达, 特别是隋唐施行的科举选拔制度, 社会主流教育以科举考试为中心, 主要通过私塾接受教育, 通过六学二馆进行理论研究和传播儒家学说,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成为当时社会的主流思想^[1]。

受“重举业轻经世”观念的影响, 职业教育难登大雅之堂, 往往通过家传和师徒传授的形式进行。唐代设立的六学二馆以儒家学说为主, 同时也设立了以医学和农学为主的行业管理和培训的机构, 设置了相应的职业教育课程, 官方组织的职业教育开始出现。但是, 由于这些机构的主要功能是为皇家和有关行政机构服务, 并不对社会完全开放, 对朝廷的社会管理活动也不会起到很大作用。到了宋代, 全国已经形成了庞大的官营手工业系统, 对职业培训更

加规范化, 教学形式以现场传授为主, 师徒关系紧密, 受到“言传身教”这种教育模式的固有局限, 整个职业教育的效率较低。明朝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 手工业艺人不再完全依附于官营系统, 职业教育开始走进普通百姓的生活。

尽管各个时期也出现了很多能工巧匠, 我国主要存在师徒传授的这种教育形式难以培养大量的技能人才, 再加上没有相应的理论作为支撑, 不便于传播, 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有限。简单来说, 纵观我国的古代史, 尽管在特定历史时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但是由于君主专政与人民当家做主本身就是对立的, 统治阶层所有的治国理政也不能上升到社会管理的高度。而且, 由于全社会深受“万事读书高”的影响, 自上而下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治国理政的学说, 而广泛存在于普通老百姓的技能传承并没有得到社会主流的认可, 更加谈不上在全社会范围内开展有组织的职业教育。

二、近现代的社会治理与职业教育

近现代时期(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是我国进行社会深刻变革的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 中国从封建社会过渡到半封建社会半资本主义社会, 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激烈碰撞, 整个社会也动荡不安, 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社会治理根本无从谈起。

我国规模化、有组织的职业教育可以追溯至洋务运动时期举办的福建船政学堂(1866 年开办), 其办学目的就是培养船舶设计与制造、航海和海战的人才, 所属的技工学校(1868 年设立)培养造船工人、高级技工和监工。这种办学模式一直沿用到民国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有以培养职业军人为主的黄埔军校等各类专门学校)。

进入民国以来, 我国的职业教育开始受到社会各界以及中央政府的重视, 全社会也开始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受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影响, 1912 年, 时任教育总长蔡元培把实业教育列入国民教育系统; 黄炎培等人在 1917 年发起并成立了中华职业教育社, 在《中华职业教育社宣言书》中提出用职业教育振兴民族工商业^[2]; 1918 年, 中华职教社创办中华职业学校, 被公认为中国近现代第一所真正意义上的职业学校^[3]; 1921 年, 中华职教社发起并主办了全国职业学校联合会, 并逐步发展成为全国性的教育组织, 由中华职教社制订的《职业教育设施纲领》成为职教界共同遵循的标准; 1922 年,

北洋政府正式明确“职业教育”的名称,实业学校随之更名为职业学校,中国近现代职业教育正式形成。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全国范围内的职业学校近两千所,在校学生近五万人。

由于国内局势所限,我国尝试走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基本上照搬欧美国家,尽管民族工商业得到较大发展,但是广大的农村和大量的农业人口以及低下的农业生产水平并存,我国仍然没有彻底实现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军阀割据、混战,社会管理整体上处于无政府的状态。

尽管当时对职业教育的探索顺应了全球工业革命的浪潮,对当时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这个时期的职业教育并没有从国情出发,照搬西方教学模式,主要以培养行业工人为主,培养周期也不长,整体水平较低,学业与工作差距较大,难以满足社会需求,被时人讥讽为“失业教育”。

三、当代的社会治理与职业教育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社会治理大致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初期至本世纪初期和本世纪初期至今,我国的职业教育在这三个阶段也具有显著的时代特征。

(一) 社会管理方式过于简单,职业教育具备雏形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初期,尽管我国初步建立了以国防科技为代表的现代重工业体系,但轻工业体系不够完备,同时农业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较高。这段时期,国民文化基础普遍薄弱,工矿企业也多以师傅带徒弟的形式培养产业工人,广大农村主要以“文化扫盲”为主。从全国范围来看,进行职业教育主要通过识培训班、夜校、厂矿内设的技工学校、行业举办的中等专门学校、高等专门学校和各类干部管理(培训)学院(学校)等形式进行。这些中专和专科学校的毕业生大多直接对口就业,学校承担着为企业和行业输送一线劳动者的责任,为建国初期的国民经济社会发展起到重要作用。但是这些学校的专业设置和课程体系主要模仿前苏联模式,人才培养也不是完全面向市场。

这段时期内,国内社会管理(国家层面还没有提出社会治理的概念^[1],但是具体的社会管理活动一直存在)的方式过于简单,职业教育也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模仿前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以发展重工业为主,农业生产力相对落后,整个经济社会处于较低的发展水平,对普通劳动者的要求并不高。尽管存在多种职业教育形式,笔者认为并没有形成完整的职业教育体系。

(二) 社会管理越来越受重视,职业教育体系基本成型

改革开放初期关于教育本质全国性大讨论的结果表明教育本身具有生产性,这个特性决定了教育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特别是职业技术教育应该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1983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把“职业技术教育学”正式列为教育学的二级学科^[2],拉开了全国范围内建设职业技术教育学科的帷幕。到上个世纪末期,国家陆续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决定》、《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等文件,职业技术教育学科也建立了完整的师资培养体系,部分学者也尝试着建立职业技术教育学科自身的架构^[3]。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特别是轻工业跨越式的发展,到本世纪初期,我国基本建立了完备的现代工业体系,完成传统意义上的工业化,第二产业占据国民经济的主体地位,第一产业占比逐渐缩小,第三产业处于高速发展阶段,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提高很快。随着产业不断升级,整个社会对劳动者的技能要求越来越高,沿海地区尤其突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东南沿海地区兴办了一批以技术培训为主的短期职业大学,邢台职业技术学院于1991年率先在全国

试办高中起点、专科层次的职业教育^[4]。世纪之交,在国家扩大高等教育规模的背景下,高等职业院校在学校数量和招生规模上都呈现了爆发式的增长。

整体上来说,在改革开放后至本世纪初期,随着产业不断地升级,我国逐步建立起以职业高中、中等职业学校(含各类技工学校)和高等专门学校、高等职业学院(三年制,简称高职高专,下文没有特别说明的均指这类)组成的职业教育体系。在这个过程中,有条件的中等职业学校升格为高等职业学校(学校名称一般用职业学院、职业大学或职业技术学院标识,以达到与普通高校区分的目的),尽管中等职业学校面临越来越严峻的生存困境(国家的定位是职业教育的基础,后来推出了3+2的中职和高职衔接的培养模式),但是由于高职高专数量和规模的高速扩张,职业教育整体上进步很大。高等职业教育取得成绩的同时也存在很多问题,尤其是仅重视规模的扩张,忽视了质量的提高,办学定位不够准确,学生毕业后难以找到合适的工作,而企业又难以招聘到合格的人才,导致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严重脱节。

这个时期内,社会管理(2004年首次提出)上升到国家层面,尽管是作为一个政治议题首先被提出,理论界开始进入深入的研究,形成了诸多研究成果。同时期内,职业教育体系基本成型,作为社会管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逐渐成为教育界研究的一个热点。

(三) 不断完善社会治理制度,深化职业教育体制机制改革

进入本世纪,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不确定性增加,特别是信息化浪潮席卷全球。国家顺应时代潮流,大力发展信息产业,数字经济占国民经济的比重越来越高,对经济社会影响的程度越来越深,对各行各业从业人员的综合素质要求也越来越高,我国进入后工业化阶段。随着我国经济结构不断优化、产业转型升级的速度不断加快,全社会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缺口越来越大。有数据显示,我国高技能人才占技能人才总量的近三分之一,国家加大了发展高等职业教育的力度。在此背景下,温家宝总理在2005年召开的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上提出大力发展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5],这标志着我国的职业教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自此以后,高等职业教育从粗放式发展向内涵式发展转变,在职业教育体系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为了适应经济社会对技能技术人才需求在质量上的提升,石伟平和潘懋元等人基于经济发展、科技进步、教育发展和民众需求等因素提出“高等职业教育是一种教育类型而非一个层次”^[6]，“建立本科职教,形成完整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观点(2006年教育部印发的《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中首次明确提出高等职业教育是一种教育类型^[7],并要求这类高校今后必须坚持走内涵式发展的道路,并通过实施国家示范高职院校、国家骨干高职院校和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等三大工程,大幅提升了高等职业教育办学的整体质量),为接下来应用型本科和职业本科教育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有学者认为这两者基本一致,也有观点认为完全不同。从人才培养的定位来看,笔者认为两者的差别不大,本文把应用型本科教育也纳入职业教育体系)。本世纪初至2019年是国内建设应用型本科院校的高峰期,主要是通过地方普通本科高校转型和综合性大学所属二级学院举办等形式进行。自2012年开始,教育部在部分省份通过公办普通本科高校所属的二级学院独立举办本科职教和由公办高职专科学校与公办普通本科高校联合举办两种方式进行职业本科教育的试点工作,正式开启了职业本科教育的探索之路。比较重要的时间节点和文件包括:2014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中首次(下转第206页)

打肌肉时出现过大的运动,导致出现诸如背痛等症状的小颞叶变形。手部损伤的严重程度仅次于腰背部损伤,运动员需要在手部长期的缠绕绷带然后在外配上拳套与其他运动员进行搏击训练或者是捶打沙袋,握拳后掌指关节是主要受力部位,在长期的击打过程中力的相互作用使得掌指关节有不同程度的损伤。

3.1.2 急性损伤的性质和发生的原因

这项调查的结果表明,拳击中的身体损伤会造成更大的损伤、挫伤或扭伤,而严重的损伤则主要是由于技术操作不规则、过程重复、准备活动不充分等造成的。

拉伤:拳击运动员在进行增强力量的锻炼时,肌肉拉伤最是容易发生。在在训练期间,运动员往往更有心理准备,为了让自己的力量更加强大,他们往往会在运动中增加抵抗运动的重量,这大大超过了他们的最大负荷,造成不必要的伤害。还有一个关键因素即在

进行训练前的没有将身体充分的预热,身体各部位肌肉没有兴奋性。

扭伤:扭伤常常发生于四肢末端小关节和各大关节处,其中掌指关节和指关节损伤发生率较高。

挫伤:拳击运动员在激烈对抗或来不及对对手的进攻采取有效防卫手段时,彼此肢体的猛烈撞击会造成局部疼痛、压力疼痛、肿胀和功能失调。

总而言之,及时的对急性损伤进行当场有效治疗在拳击运动日后的恢复以及正常训练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4 结语

在开展青少年拳击运动训练的过程中,重视运动损伤问题,并根据项目特点采取合理的安全防护措施是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必要的,教练员应针对训练和竞赛中运动员的损伤情况,积极、主动地进行有效干预,不断探索有助于预防运动损伤的方法和措施。

(上接第 204 页)

提出“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概念^[8];2014年6月,教育部等6部门联合发布了《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9];2019年2月,国务院印发了《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2019年7月和12月教育部分两次批准了21所本科层次职业院校;2019年12月,教育部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10];2021年1月,教育部发布《本科层次职业学校设置标准(试行)》和《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管理办法(试行)》,标志着职业本科教育正式进入规范建设的阶段。

多年实践的经验表明应用型本科教育存在诸多问题,比如形式上转型而未在人才培养机制等方面有实质性转型;很多高校希望办成研究性综合型大学,但是又不符合国家相关政策的导向,这个转型过程总是处于摇摆不定的状态,这部分本科高校不愿意扣上“职业教育”的帽子。其实,这里面关键的问题是办学定位不明确,相比研究型本科教育和职业本科教育,应用型本科教育并没有体现其独有的价值,导致的直接结果是家长和学生认为应用型本科低于研究型本科一个层次,但高于高职院校一个层次(在高校招生的环节上放在本科第二批次),对应用型本科高校出现认知偏差。

事实上,通过非独立办学模式进行的职业本科教育试点的效果也不好。以江西财经职业学院与江西财经大学联合举办的职教本科班为例,2014年开始招生,2021年将停止合作办学,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两个办学主体的利益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江西财经大学认为合作办学降低了自己研究型大学的身份,并且占用了自身的招生名额,毕业生的水平相比本校来说略差一些,对社会声誉产生了负面影响,也切实影响到经济利益。江西财经职业学院尽管通过合作办学提高了社会知名度,有利于招生和积累本科办学的经验,但是职教本科班的主导权事实上掌握在江西财经大学手里,然而江西财经大学本身在职业教育方面并不比江西财经职业学院具有优势,在人才培养定位和课程设置、教学组织等多个环节的意见不一致。简单来说,由于利益分配机制和办学管理体制等方面的不协调,导致这种合作办学的效果并没有达到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和社会各界的预期。

这个时期,随着理论研究成果的丰富与实践经验的积累,社会管理进一步深化到社会治理(2013年首次提出)层面,逐步建立起一个完整的社会治理体系,理论研究和实践上都取得重大成果。与此同时,职业教育体系也在不断完善,特别是经过试点以后,从上至下对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认识发生了很大变化,将成为下一个阶段职业教育的中心工作。

综上所述,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职业教育体系从无到有,从单一到完善,从服从计划到主动面向市场,坚持服务于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为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职业教育以市场为导向、以就业为目的的特性决定了其完全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大量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当前的职业教育体系又难以胜任这个重任,职业教育体系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这种矛盾迫切地需要调和,这也是当前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内容。

四、结束语

纵观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史,社会治理和职业教育联系紧密,都具有典型的时代特征。职业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教育又是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职业教育服务于当时社会治理(管理)的需要,同时也受到社会治理制度的影响。当前,数字经济在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日益增强,对社会治理和职业教育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对职业教育的改革必须在社会治理的框架下进行,才会少走或不走弯路,办人民满意的职业教育,取得让社会各界都满意的成绩。

参考文献:

- [1]向慧.“三型”劳动者培养目标下高职商务英语专业课程设置研究[D].西南大学,2020
 - [2]李霞.民国时期教育方针的精神主旨研究[D].内蒙古师范大学,2011
 - [3]李达.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体制:历史、实践与目标[J].重庆社会科学,2020(5)
 - [4]匡璞,石伟平.改革开放40年职业技术教育学科发展的回顾与思考[J].教育研究,2018(10)
 - [5]郭俊朝.建国60年来我国高职教育的回顾与展望[J].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09)
 - [6]陈燕.中高职教育衔接的制约因素及发展对策——以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为例[D].湖南师范大学,2017
 - [7]方泽强.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及现实问题[J].职业技术教育,2019(34)
 - [8]聂伟.本科职业教育专业怎么设[R].光明日报,2020-04-28
 - [9]丁建荣.合作办学共同育人创建特色鲜明的应用技术型本科院校的实践与思考——以浙江警察学院为例[G].新建本科院校联盟2014研讨会,2014(10)
 - [10]夏霖.韩国振兴产业教育法及其启示——韩国《振兴产业教育及促进产学研合作相关法》探析[J].高教探索,2020(4)
- 作者简介:方道华,男,湖北襄阳人,副教授,研究方向:管理会计理论与方法